

郑毓瑜 著

引譬连类

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非外借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引譬连类

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郑毓瑜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 郑毓瑜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1
(文史新论)
ISBN 978-7-108-05766-2

I. ①引… II. ①郑…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399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原著作名
《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特约编辑 石少欣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219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诗与物

《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王德威

“抒情传统”是台湾汉学界对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重要贡献。1958年，任教美国的陈世骧教授在台湾大学讲授诗歌，重新介绍抒情观念，以后十余年更继之以重要论文多篇。到了1971年，陈教授总论研究所成，指出中国早期文学“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涵蕴上看来都是抒情的”。中国文学精髓无他，就是“抒情传统”。^{〔1〕}

陈世骧教授的观点日后有同在美国的高友工教授回应。两人方法虽有不同，但对抒情信念都是一往情深。20世纪70年代末高教授来台讲学，启发一辈青年学者；1985年更提出“抒情美典”观念，视野扩及文学以外，包括音乐、书法、文人绘画等。抒情与中国人文艺术精神的互动，因此更见丰富魅力。

由陈、高两位教授所引领的“抒情传统”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台湾开花结果。柯庆明、吕正惠、颜昆阳等教授梳理抒情源流，蔡英俊、张淑香、廖栋梁、龚鹏程等教授思考，甚至辩难抒情理念，仅是其中佼佼者。香港的陈国球教授、新加坡的萧驰教授也相与呼应，形成庞大脉络，影响至今更及于现代文学研究。

郑毓瑜教授的治学成就必须置于这样的抒情传统脉络里，才能显

〔1〕《中国的抒情传统》英文稿首次发表于 *Tamkang Review* 2.2/3.1 (Oct 1971/Apr 1972): 17-24。此文中译（杨铭涂译）和其他有关抒情传统文章均收入《陈世骧文存》（台北：新潮出版社，1972），页32、35。

出意义。她早期的六朝“文气论”、“情境美学”探究，到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等作，已经展现端正大方的研究气度。而在《文本风景》(2005)里，郑教授的眼界陡然开放，屡屡给予读者惊喜。这本论文集以自我与空间的相互定义切入抒情传统研究，无论是对中古城市作为一种兴亡的景观现场，地方风土与诗情史识的互动，身体与自然所滋生的情感、知识体系，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郑教授认为抒情之为“物”，不必局限在一般感时伤事的窠臼里，而是蕴含绵密的感官、地理、思想的编码体系，由此展演的诗歌形式，曲折幽深，才能真正体现“抒情传统”的博大。

郑教授的新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即是据此加以延伸的系统化研究。这本专著探讨传统抒情诗学“引譬连类”的特征和在文学、文化史中深远的影响。顾名思义，“引譬连类”指向古典诗歌中所表达的关联式思考的倾向和实践。“引譬”借此喻彼，“连类”连锁引类，都是启动诗歌想象的修辞方式。郑教授指出“引譬连类”的渊源来自中国诗学的“比兴”正宗：西汉孔安国即将“兴”释为“引譬连类”。邢昺疏曰：

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

而最为我们所熟悉的解释出自《文心雕龙》：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刘勰认为诗与物相互感动，不仅带来心身体气的交流汇聚，更与万象形成宛转应和的关联。而诗人出入感物连类的体系，发情采为辞章，自然占有关键位置。

识者或认为这样的观点不外传统诗学由物色而情动、由情动而辞

发的演绎。但这正是郑教授思辨的起点。在她看来，情与诗与物的关系在中国的语境里如此繁复绵密，我们的讨论因此毋须局限于感物/感悟的诠释模式。“情”在语源学的流变里不仅指的是七情六欲的情，也是情实和情理的情，更是“道出于情”（《郭店楚简》）的情。如此，抒情传统的格局豁然开朗。

本书的关键词“引譬连类”一般多以修辞法则视之，郑教授则别有所见。她强调修辞作为物象的一部分，由引譬连类所接引、衍生、创造、应用的过程也可以及于其他生命层面，包括感官体气的调和、地文气候的判别、政治外交的辞令、医疗诊治的方法、国族意识的表彰、哲学思考的模式等。究其因，“引譬连类”形成知识体系，也同时由这样的知识体系所带动。由感知到经验，由常识到玄思，郑教授认为“引譬连类”不妨可以作为中国传统认识论的一种起源。

这是视野相当庞大的界说，所引发的丰富问题有待我们持续思考。就此书所及，郑教授以六章专论作为六种探讨的门径。第一章讨论“体气”与“抒情”，承袭《文本风景》已经提出的身体与诗学讨论，指出抒情的修辞功能会意形声，与身体郁闷或舒缓、充盈或匮乏形成微妙的震荡。所谓“发愤而抒情”（《九章·惜诵》），此之谓也。据此，郑教授其他各章更讨论讽诵的愉悦、劝诫乃至医疗功能；《诗经》以降的“重复短语”所投射的风土地理经验与延伸譬喻；“替代”与“类推”所置换排比、堆叠辐辏而成的历史、伦理关系网络；“类”与“物”构造的知识论。本书的第六章则以黄遵宪诗歌为例，讨论晚清知识分子如何援用、变化“旧诗语”以为理解甚至掌握“新世界”的方法。如此，从抒情传统的两端——远古与近代，本书勾勒千百年来“引譬连类”如何在身体、文化、知识等层次，不断重塑也延伸我们感时观物的现象。

由于所学有限，我其实不足以评点郑教授的新著。但既然“抒情传统”出自现代对古典的发现甚至发明，我们或许得以从比较文学角

度，再思“引譬连类”的诗学意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俄国形式主义大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对诗歌语义学的研究。雅氏认为语言表意过程中，选择轴（selection）和组合轴（combination）或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的对立，组合为人类语言两种基本运作方式。诗歌是对这样的对立轴线精密的创造，不仅在隐喻的选择轴显示对等原则，而且在转喻的组合轴上如语音、节奏、句法等也要显示对等原则，从而在隐喻和转喻双轴上形成相似、对称、平行等关系。雅氏因有名言：“诗学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上投射到组合轴上，对等被提升为句段的构成方法。”^{〔1〕}

雅各布森的影响深远；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巴特（Roland Barthes）的批判符号学都有脉络可循，70年代高友工、梅祖麟教授对唐诗的意象研究也曾点明师承。乍看之下，雅各布森的隐喻/选择与转喻/组合轴系统与“引譬连类”有相似之处，都着重符号类比下的意义衍伸。但雅各布森一脉学说坚持科学式抽象结构，以之作为放诸四海的规则，而郑教授借“引譬连类”则强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语言修辞的套数如何与生存体验相与为用，回旋辐辏，“联类不穷”。雅各布森最知名的语言基型（parole）和言说表现（langue）的二分法因此不存在抒情语境里，因为他设想的结构万变不离其宗，而中国诗学里的“兴”所启动的绵延脉络首先就不能存在。

另一方面，“引譬连类”也让我们联想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名著《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中部分说法。此书考察16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的兴起与沉落，而以文艺复兴过渡到新古典时代，以及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过渡到现代的两次断裂为焦点。福柯认为每一个时代有独特的认识世

〔1〕 Roman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homas 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0), p. 358.

界、为事物命名的模式，因此组成的“事物的秩序”也就是知识的特殊形构——福柯称之为“知识型”（episteme）。现代知识型的关注点是“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福柯表明，随着各种研究“人”的学问——从精神分析到人种学，从语言学到经济学——的消长，我们曾经见证“人”的生成，也必须见证“人”的必定消失。

福柯一方面与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新科学呼应，强调人发明世界、赋予意义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延续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质疑人的存在意义。他的研究方法夹处在结构和解构主义的转折点上，历来引起相当争议。郑教授的研究其实注意到“引譬连类”与福柯所描述的16世纪末之前西方以“相似性”（la ressemblance）为准的“知识型”（包括“适合”、“仿效”、“类推”、“交感”等元素），但她也同时指出，在抒情传统里，人与知识的定义与分野不必永远定型在“知识型”里，而人的出现与消失也未必因为知识型的转变而有了宿命般的结果。

福柯将他的研究名为《词与物》，着眼西方现代视野下的人借语言命名、认识事物的一幕幕悲喜剧。郑教授研究中国抒情传统里词与物的关系，却得出不同结论。这一结论，不妨名之为“诗与物”。以此，她指出诗在中国人文传统的中心位置，贯穿主体的内与外，同时展现在宇宙生命不同面向的对话中。这是与福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用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话来说，如果西方的诗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封闭系统，是隐喻性的虚构，那么中国诗歌的生成从不被当作虚构，而被视为“诗心”与历史和世界遭遇、经验、互动、契合的结果。^{〔1〕}

最重要的，郑教授借着“引譬连类”的研究，再次提醒中国“文”学浑厚绵延的体系：记号—样式—文饰—文化—学问—著作—文学。她尤其强调“情”与“物”两者之间的交错关系，从体气到感通，从

〔1〕 Stephen Owen, “Omen of the World: Meaning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ch. 1.

兴发到格物，千丝万缕，相互融成。知识既是情的结晶，也是物的类应。人既是启动知识的有情个体，也是完成物象的部分。而这些关系的交集无他，就是诗。而借由诗，人文的各个层次相互照应、会通有所焕发出来的总合现象，就是文明，“文”、“明”。

回到“抒情传统”的论述。半个世纪以前陈世骧教授构思“抒情传统”时，固然是向一个以诗歌为大宗的文明致敬，同时也应该是面对中国的现代经验如此隐晦不明，有感而发。“抒情传统”存在与否是一回事，但一旦命名，就成为一个学术方向的起点。这是一个“抒情的”文学史观，本身就是一项兴发。而在新世纪召唤“抒情传统”，郑毓瑜教授以“引譬连类”再次为这一传统做出新的命名。她的工作不但深化了传统，也再次发明了传统。《引譬连类》是一本具有相当思辨深度的专著，郑教授索序于我，让我愧不敢当。有感于她对中国诗学研究的专志与慧心，谨此聊志数语，表达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敬意。

前言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由先秦两汉阴阳五行的思想, 认为中国古人有一种“关联的思考” (correlative thinking), 并认为在关联式思考中, 事物是借感应而相互影响, 并非由于外在的因果推求; 而通过类应所形成的系统, 万物密切结合在一起而构成自然有机的和谐世界。^[1] 虽然李约瑟认为古代中国通过“关联式的思考”所形成的有机整合世界, 类似原始科学的论述, 但是, 如冯耀明也已经提出辩驳, 认为李约瑟由汉代思想所归纳出的天人之间的“神秘的共鸣” (mysterious resonance), 其实是由“自然主义的事实陈述”与“基于人文观点而做的规范性描述”所混合的宇宙论, 既不是经验层面, 也不是在逻辑层面上进行, 更不是基于某种成熟的科学观念。^[2] 换言之, 这种“关联式的思考”并不是专为逻辑推理而设, 当然也不能片面要求这种思考模式会促进某种科学或哲学化的论述模式的产生。^[3] 仔细检阅上古相关文献, 会发现所谓“引譬连类” (或“引譬援类”) 可以

[1] 见李约瑟著, 陈立夫主译,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页 372—378。

[2] 参见冯耀明, 《论所谓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评李约瑟的观点》, 《清华学报》新三九卷四期 (2009 年 12 月), 页 505—528。

[3] 也有学者根据庄子或墨子对于混同一切的类比的批评, 而认为这个先秦以来的类比是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 如施淑, 《汉代社会与汉代诗学》, 《中外文学》十卷十期 (1982 年 3 月), 页 70—107。但是, 施淑虽然批评这种无所不包的类比, 却也承认像孔子说诗其实将诗由赋诗的仪式中解放出来, 而赋予多义性的诠释可能。

说是总括自先秦逐步发展而来的一套生活知识或者说是已成共识的理解框架，它跨越不同物类、引生彼此应和，时时牵引着群体或个我的种种身心行动；这个“连类”模式因此不是逻辑论辩的程式，而是理解活动进行的基本框架，凭借这个框架，触动或开启我们的视野，导引眼前与过去的深远的连结，让身体与世界对谈出整体知觉，同时让传译的语言文字如织锦般焕发显现。通过这个娴熟上手的理解框架，我们累积知识，同时也累积身体实践的体验，进而开发洞见；我们越来越纯熟地进行“想成”、“视如”的概念理解活动，通过会聚与亲附，我们跨越表象差异所形成的类别界线，在不断越界中去钻探共存共感的底层。

换言之，这些关于“引譬连类”的论述，最根本的关键显然就在于“越界”或“跨类”（cross categorical boundary），单就文学研究来说，如果置放回“引譬连类”的思考（理解）背景中，像物/我、身/心、言/意、文/情等议题，是否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诠释？比如：在文学经典中这些“物类”、“事类”系统究竟如何形成，而这些分类系统又是如何联系彼此而成为有意义的关系体？其次，这些连类关系的形成与个我的身体实践如何相关，尤其在什么样的感知或行动状态下，这完整的连类意义会被“体现”？再者，这些通过分类、连类所形成的关于事、物并与人情感知相应的共识体系，如何被传移摹写，尤其是通过什么样的表现技法或体类规模，可以保证这个共识体系的在场？而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关键其实是如何成类与连类。提到“类”，很容易让人想到类书，但其实在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对于种种知识的分类，比如《尔雅》对于语词的训解分为十九篇，“释詁”、“释言”之外，还包括像“释宫”、“释器”、“释天”、“释地”等，可以说是针对当时词语使用对象的分类，如同生活世界的“百科名词”，^{〔1〕}

〔1〕 参考夏南强，《类书分类体系的发展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四十卷二期（2001年3月），页130—138。

又如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汉书·艺文志》中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同时将单篇诗、赋辑为“诗赋”略，关于“赋”又区分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及杂赋四类，^{〔1〕}似乎与曹魏以后文体论的出现有不可忽视的关联。^{〔2〕}这通过语词训解或书篇辑录所进行的分类，说明了分类可以不仅限于史家、小学家或目录学者的专业目的，分类所发挥的作用更根本是在于建立知识体系，甚至成为生活实践之必要准则，也因此，关于文学的研究同样不可能脱离这分类系统所建构的关系世界。

方师铎的《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3〕}一书就是当代讨论文学与类书关系的重要著作，其中最着力的两点是：其一，将总集也纳入类书领域，让“类文”的《文选》、《文苑英华》等也成为类书的一部分；其二，由词汇学的角度来看辞赋，将辞赋视为类书的前身，这两点凸显了“类事（物）”或“类文”不只是单纯地有助于隶事或论述文体，文学领域中的类别区分，也都应归属于认知世界的方式之一，换言之，类分事物、词语或文体，同时也可以说是架构某种看待世界的模式。不过，如果要借助类书资料来诠释文学作品，其实还有更大的困难，因为类书着重在类分，对于如何“连类”并不是考量重点，除了很明显地自唐代以后大抵建立了“天一地一人一事物”的次序，对于类与类之间或每一类所包含的子目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联性，似乎并无法从类书已有的辑录状况得到具体说明。除了可以翻查已有的名物注释，面对文本中往往是多样事物的

〔1〕 参见汉班固，《汉书》（台北：鼎文书局，1977）卷三十《艺文志》，页1747—1753。

〔2〕 褚斌杰于《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绪论”中认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将赋分为四类，虽然还不能说是文体论，但试图加以分类的努力，似乎可以说是“对后来文体的发展和文体论的产生曾间接地起过重要作用”，页15。

〔3〕 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台中：东海大学，1971）。

组合，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可能还在于探索事（物）类之间的关联性与组合后的意趣引生。换言之，当焦点放在文本，而不只是个别事物的孤立分判，事（物）类如何被应用、诠释与取舍、再制，以及这名物连类的效果究竟如何开发文学诠释的新视域，成为更迫切需要探索的焦点。

以《诗经》为例，针对《诗经》名物的诠释其实早已成就《诗经》研究中“博物学”的一支，^{〔1〕}三国时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最早的代表作，到了清代甚至出现如日人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2〕}图文并置，而现代学者利用植物学、动物学等新知识，也仍有如《诗经中的经济植物》^{〔3〕}等著作不断出现。对于名物的古今命名、物理特性或相关记载加以梳理，这当然是理解《诗经》文本的必要基础，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这种《诗经》博物学的研究，往往只在“多识”这方面着力，欲忽略了“诗意”的推求，^{〔4〕}也就是“诗”与“物”仍无法相交融。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如果回到作为解诗要则的“比兴”来说，颜昆阳认为：“比兴本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观念……（而）是古代诸多文士对宇宙、作者、读者、作品诸因素互涉的人文活动经验所产生的体悟与言说”，^{〔5〕}亦即，“比兴”本来就不仅止于名物训解，而

〔1〕 参考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3），“诗经的博物学发端”一节，页117—119。

〔2〕 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六十四、总第七十册，页70——至70——二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日〕冈元凤，《毛诗品物图考》（台北：广文书局，1985）。

〔3〕 耿焄，《诗经中的经济植物》（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

〔4〕 例如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首章《诗：文学的，历史的》就认为现有《诗经》名物训解往往只见“物”，不见“诗”，页2—5；又如李湘，《诗经名物意象探析·例言》（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也说到这些名物注疏虽然注解了名称、性状与类别，但是“对于理解诗意，并无多大帮助”，页2。

〔5〕 引自颜昆阳，《文心雕龙“比兴”观念析论》，《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十二期（1994年6月），页33。

可能是“人文活动”的全面图式。西汉孔安国直接释“兴”为“引譬连类”，而邢昺疏曰：

诗可以兴者……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1〕}

“引譬连类”，其实就是比类、比譬，邢昺直接将“比兴”连言，正解释了孔安国所谓“引譬连类”也是视“兴”如“比”。而孔颖达释《诗大序》“六义”之“兴”，就融合了孔安国的说法：

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2〕}

由反复出现的所谓“连类”、“引类”，说明了比喻或譬喻其实是两种“类”别之间的联系，并非两个孤立事物的比拟，换言之，“比兴”或者称为“譬类”，其实是关于“成套的”譬喻，任何“比兴”的说解其实是由整个系统去决定它的含义。现有的关于名物譬比的说解往往太近似字书或辞书的本义解释，或仅针对单篇诗的语境进行说解，因此难以明了当时的文本环境中究竟如何理解与交互应用这些语词所指涉的概念结构。

既然由“譬类”——也就是“成套的”譬喻出发，这显然就不是个别“物与我”或“情（事）与景（象）”的对应问题，而是在一个“概念系统”之中如何被认定，或是两个“概念系统”之间如何相互理解的问题。而西方晚近由雷可夫（George Lakoff）和詹森（Mark

〔1〕 引自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十三经注疏本）卷十七，页156。

〔2〕 见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十三经注疏本）卷一一一，页15。

Johnson) 提出的“概念譬喻”(conceptual metaphor) 的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我们所谓“成套譬喻”的解析。雷可夫和詹森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这本书里曾以空间譬喻为例,说明每一个空间譬喻都有一个内部系统(internal systematicity),如“我情绪高昂”、“精神大振”都源出于“快乐至上(up)”这个概念系统,而且这比喻概念界定一个整体相合的系统(defines a coherent system);^[1]而人的完整理解活动其实常常通过两个以上的概念譬喻来完成(如来源域与目标域),换言之,人不但必须掌握各个譬喻系统内部的相合性,还必须掌握两个以上的譬喻系统的相合性。比如,“在这点上,我们的争辩并无多少内容”,其实就结合了“争辩是旅行”与“争辩是容器”两个譬喻,而对于所争辩的范围与内容进行检讨。^[2]雷可夫和詹森的“概念譬喻”虽然主要是以日常用语为讨论焦点,与文学文本之间显然有距离,但是,文学中的“譬类”如果可以由两个以上的譬喻系统来理解,并尝试由来源域(如旅行、容器、食物)去追索目标域(如爱情、争辩、思想)的譬喻意涵,不但可以避免孤立化、受限于单篇语境的意象解释,也可以得出更根本、具体的单一或多重譬喻体系的实际经验与运用原则。

雷可夫和詹森的理论认为,譬喻的使用常常是通过一个比较熟悉的类别(categorization)去理解一个较难理解的类别,最明显的如拟人法,而人的身体经验又成为许多譬喻理解的基础。^[3]这也许可以进一步解决许多抽象感知的诠释问题,比如通过身体行动的进出、上下

[1] 参见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ch. 4, pp.15-17。中译参见周世箴译注,《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6)第四章,页28—37。

[2] 相关说法参见 *Metaphors We Live By*, ch.16-17, pp. 87-105。

[3] 相关说法参见 *Metaphors We Live By*, ch.6-7, pp.25-34。又参考苏以文,《隐喻与认知》(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第三讲《对实体的感知与思维》,页17—22。

所牵引的空间感知，来应照季节的来去（如春天的脚步近了）或心情的哀乐起伏。笔者过去针对节气感的研究也曾经注意到，许多“感物”的悲秋诗作，所欲传达的也许就是时气与体气交响的话语，以身体为核心的情绪震颤同样被涟漪一般的传响反过来层层环绕与笼罩。“这让情感成为身体可以展现，同时也是可以具体感受到的空间性的力量。这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汉末以来的‘秋’诗有那么多动作姿态，除了强调外在景物的影响力，进一步来说……这当中充满着无距离、方位与宽窄限制的相互牵引，正是这牵引关系构成了无限扩散的情绪张力网，起坐、俯仰、出还的姿态是内在的发动，同时也是风物外力侵进、围裹的承受与抵拒。”^{〔1〕}换言之，像“徘徊”、“彷徨”、“踟蹰”等语词在情绪表达上其实明显奠基于身体行动。如此，借助概念譬喻所源出的身体经验，对于某种情感的诠释也许就可以由融合实体与抽象的譬喻体系来说明，比如在《诗经》里，形容忧伤的重言（叠字）多达二十种，《尔雅·释训》曾经条列其中十个而只是总说为“忧也”，^{〔2〕}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其中如何通过度量（多、满）、定位（不定、摇荡）等有关于容器与身体行动的经验，来应照“忧心（程度）如容量升降”或“忧心（状态）如行动不定”，那么面对这一系列相关于忧心的词语，将可以通过相应的实体经验来理解。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任何感知恐怕都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属于一种经验“域”或甚至融会两个以上的经验“域”，也可以说就是牵涉两个以上的譬喻体系，或说是牵涉了知识体系、社会文化环境与当时的书写模式。于是该如何通过口说或书写来表达这种在不同“事（物）类”或“经验域”之间的相互连结（映照）（mapping）的感知，其实

〔1〕 引自拙作《身体时气感与汉魏抒情诗——汉魏文学与楚辞、月令的关系》，《文本风景：自我与空间的相互定义》（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5），页327。

〔2〕 见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十三经注疏本）卷四《释训》，页57。

就成为上古语文表述的重心。在本书中，我特别针对“重复”的语文现象加以考察，包括重言叠字、复音词（联绵词）、相同句（套语）以及名物类聚的大段落复诵，发现这些“重复”的语言现象并不能以因袭或套用一笔带过，正是在重复的轨迹里，同步体现了往复的人身经验，持续弥缝那趋向完整的感知结构，同时在这动态的建构与融会的过程中，成就不同类域间的概念理解与语言的传达。明显可见，“重复”已经通过相异却又相比的勾连与跨越，镕铸一个“‘新’相似”。我们发现从《诗经》以来大量出现的重言或联绵词的使用现象，不仅可以拟声、摹状，同时还可以跨越不同的事物类别，进行关系性的联想与体会，亦即，同一个语词的背后可能是多重知识概念的映照，往往是由最熟悉的至少一个概念领域去映射另一个等待被理解的概念领域，而这类可以形容整全身心（实体与抽象）经验的语词就成为建构譬喻关系的所在。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上古文学中数量庞大的重言叠字或联绵词重新整理，也许可以寻索出某些最常被呈现的连类式的感知状态，从而对于上古的身体经验及其相牵涉的主体观念、情思模式、场所感知等，究竟如何相交融而构成一个社会文化最基础的概念体系，做出更进一步的诠释。

借助“譬类”作为研讨的路径，我们在“连类”之中进行着“譬喻”活动，在思考、行动（经验）与语言诸类域间相互进出、对话并整合出意义；这个“赋义”的运作体系，因此同时也是看待世界、处身世界与描述世界的架构，是这个意义架构“触动”、“运转”了身心、物我与言意之间的相互照面与交融，也正是这个仿佛显影剂的触媒，让底层深处不可见的相互贯通浮现出可以沟通与理解的形式。在“成套”的譬喻与所构成的“成串”的意义中，诠释者的眼光必须从记号及其所指称的名物，转而探索语文策略所能酝酿发酵的联系与共感；当语文应用处在“连类”背景下，“字（词）”与“物”的“譬喻”是为了浸润出整全厚实的生存所在，同时又蔓衍出可以实践的本体功能。